

在深刻把握客观规律中把握正确政绩观

王娟

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重要论断,将政绩观提升到“根本性问题”的高度,蕴含着深厚的理论洞察与强烈的现实关切。深入把握这一“根本性问题”,需要从政治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四重维度进行立体化透视,从而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学理参照。

政治逻辑,标定政绩观的根本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政绩为谁而立、由谁评判、以何为标准,直接反映领导干部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是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实践中的具象化表征。从政治逻辑加以审视,政绩观之所以根本,在于它直接决定着—个政党的执政底色与人心向背。

政绩观是政治立场的“试金石”。干事创业是把个人升迁、名誉地位放在重要位置,还是把人福祉、长治久安作为唯一追求,这从根本上体现了“公”与“私”在领导干部灵魂深处的分野,也体现了领导干部坚持的是什么样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这正是正确政绩观在政治立场上的生动注脚。真正的政治忠诚和政治伦理,不是空洞浮夸的高调表态,不是锦上添花的沾名钓誉,而是在面对沉疴痼疾时敢于啃硬骨头、面对群众急难愁盼时勇于挺身而出。

政绩观是政权稳固的“承重墙”。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最怕政绩观扭曲导致脱离群众。现实中,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之所以被群众诟病,在于它们背离了政治伦理,透支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政治上看,抓政绩观就是抓政治建设,就是抓政治安全,就是防止“塔西佗陷阱”的政治自觉。

政绩观是党性纯度的“测量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在这个意义上,政绩观问题就是党性问题,它从源头上决定着党的执政骨干以什么样的状态、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奋斗。抓牢了正确的政绩观,就抓住了党性教育的微观基础,就能使广大党员干部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有了可感知、可衡量的实践载体。

历史逻辑,揭示政绩观的内在规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执政七十余载波澜壮阔的实践中,一条“为人民创造实绩”的主线始终贯穿,引领和推动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奔涌向前。新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作为根本性问题的历史必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绩观被提升到治国理政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脱贫攻坚让亿万人口告别绝对贫困,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塑政绩观内涵,再到抗击疫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绩观的生动诠释。事实证明,正确政绩观已成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硬核准星,不断续写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新篇章。

理论逻辑,夯实政绩观的科学根基

政绩观的根基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沃土,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芒。作为真理追求与价值追求的有机统一体,政绩观联结着认识论与价值观、主体与客体、当前与长远,内在契合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并在党的创新理

论中获得了系统而崭新的阐发。

从真理维度看,正确政绩观本质上要求按规律办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把握正确政绩观,就是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政绩要求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脱离发展阶段“挨赛道”、无视资源承载“铺摊子”,在理论根源上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脱节。新发展理念之所以被称作“指挥棒”“红绿灯”,正因为它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政绩”,鲜明指向高质量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既体现为科学的发展观,也体现为正确的政绩观。

从价值维度看,正确政绩观以人民至上为逻辑起点。《共产党宣言》向世人宣告,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就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绩必须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述,体现了鲜明的群众史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升华。毫无疑问,政绩最终若不聚焦到能够为人民所体验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便会受到质疑。正确政绩观将“人民标准”作为第一标准,回答了“政绩为谁所评”的理论诘问,使政绩定位得到了彻底明晰。

此外,政绩观还内蕴着“潜绩”与“显绩”的深刻辩证法。“显绩”看得见摸得着,“潜绩”则需要历史周期才能彰显,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能简单割裂视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显绩”与“潜绩”的重要论述,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以新的时代内涵,凝结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特有的政绩伦理。

实践逻辑,验证政绩观的实际成效

道不可坐论,绩不可虚成。政绩观之所

以成为根本性问题,最终要落脚到实践维度,成为检视行为、评判得失、推动发展的刚性准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必须紧紧扭住正确政绩观这个根本,驱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迷雾,坚持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政府在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相较于成熟产业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具有显著的前沿性特征。一般而言,未来产业由重大技术突破和创新驱动而形成。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移动互联网为共性基础技术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日新月异,催生了一批未来产业的萌芽和成长。

与传统产业相比,未来产业面临更大的技术风险与市场不确定性。在技术层面,其核心技术多停留在实验室样品、小试和中试阶段,尚未形成稳定成熟的技术路线,更未实现规模化量产。在市场层面,相关产品与服务尚未获得普遍的市场认可,即便已有部分试验性产品进入市场,远未形成规模销售。由于消费者反馈有限,产品的技术缺陷难以及时修正,产业整体面临系统性风险,甚至存在夭折可能。

为此,政府在推动未来产业萌发与成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不仅是推动产学研合作、促进技术创新的组织者,还需通过国有企业、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载体,直接参与未来产业培育。通过有效的资源对接和政策扶持,降低市场主体面临的技术与市场风险,为未来产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发展未来产业须避免盲目竞争与“内卷”

培育未来产业具有较高的显示度,往往成为地方政府和干部考核的“亮点”。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具备多重功能与服务能力的人形机器人近年来成为火热赛道。以宇树科技为代表的—批人形机器人企业备受瞩目,具身智能产业也成为各地竞相招商和引进的重点。截至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及大中城市已出台支持“具身智能产业”“人形机器人产业”“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等发展规划、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部分地方未充分考虑本地资源禀赋、人才基础和产业条件,急于布局相关产业,呈现出“内卷式”竞争态势。

这种盲目竞争、不顾自身条件强行推进所谓“未来产业”的做法,折射出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有的干部心态浮躁,偏爱“短平快”、立竿见影的显性政绩,不愿扎扎实实做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工作,热衷于“造势一时”。显然,这种政绩观既不利于地方经济长远发展,也难以形成分工协作、协同共进的区域良性发展格局。

以正确政绩观耐心推动未来产业发展

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既体现为当期见效的“显绩”,也体现为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产业发展,要求我们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聚焦首位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产业梯度衔接、接续发展。

首先,应紧密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入挖掘传统优势产业特点,延伸传统产业价值链,在新的价值节点上寻找未来产业增长点。例如,推动传统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汽车转型升级,引导传统钢铁产业向高附加值复合材料方向升级。

其次,聚焦新兴优势产业,着力打造地方“首位产业”。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善于集中力量,统筹各类资源,把新兴优势产业做强做大,打造成具有竞争力的“首位产业”。长期以来,光电信息、光纤研发制造是武汉的优势新兴产业,应着眼未来竞争,进一步做大做强光电信息产业,使其成为武汉最具竞争力的支柱产业。

最后,以耐心和定力推动未来产业萌发与成长。着力培育“耐心资本”,发挥政府投融资平台和创投基金的牵引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以更加长期化、更具包容性的标准实施投资行为,武汉应瞄准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领域,深入实施颠覆性技术策源、应用场景牵引、未来产业企业培育、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未来产业人才引育和未来产业生态营造六大行动,为现代化大武汉建设谱写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作者分别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助理)

以耐心和定力推动未来产业成长

周绍东 吴君平

青马在线

中式审美,不止于美

王鑫竹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短剧《ENEMY》等作品引发广泛共鸣。中式审美持续破圈,凭借东方叙事、情感留白和中式意境打动观众,社交平台上引发高赞共鸣。我们不妨追问:这份直抵人心的共鸣,究竟源于何处?为什么中式审美能够持续“破圈”?

这种不受理性管控的身心反应,正是文化作用于个体的独特方式。这种方式藏在粉黛披甲的传统戏曲里,藏在熟稔亲切的方言乡音里,也藏在泛黄斑驳的侨批家书里。正是这些浸透着岁月与情感的文化载体,唤醒了人们对家国的眷恋、对情义的珍重、对天地的敬畏。经由它们,人们感知到流淌在血脉中的价值共识与文化基因。

中式审美的持续“破圈”,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个体对美的感知与价值判断,终究无法抽离文化土壤。中式审

美在当下的回响,本质上是一个古老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自身文化根脉的苏醒,是对自身文明价值的确认和当代表达。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当物质积累达到一定高度,社会心理便开始呈现向内转、向根寻的趋势。“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等问题,愈发成为人们普遍追问的时代命题。人们不再满足于以西方审美标准来定义先进与时尚,而是渴望在本土文化中寻找精神归属与态度表达。这种转向的深层动因,正是文化主体性的觉醒。这种觉醒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根脉延展至日常生活、从顶层设计浸润至社会心理的必然结果。

中式审美的持续“破圈”,其意义远超审美本身。当物质基础奠定之后,文化根脉的追问不再囿于学者的书斋,而成为普通人可感可触的生活实践。穿汉服的年轻人自信

展示衣冠之美,买国风文创的消费者用东方意趣装点生活,当这些生活方式成为常态,文化便不再是被动传承的责任,而成了他们主动选择的身份认同。从“要我传承”到“我要传承”,一词之差,折射的是文化传承逻辑的根本转变。由此观之,中式审美的“破圈”不只关乎风尚的更迭,更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长跑之后,从容自信地辨认自我的精神标识。这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展开,也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深层认同。

新时代中式审美的“破局”,核心在于精准把握何以转化与何以发展两大命题。文化不仅具有历史性,更具有现实性。历史性赋予文化以根脉与深度,现实性赋予文化以生机与可能。中式审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便是在这双重属性的张力中展开。一方面,中式审美的转化本质上

是解决传统的现代性问题。转化要求人们超越对传统文化表层的符号挪用与形式拼贴,转而深入其内在义理与精神。另一方面,中式审美的创新发展,则聚焦于本土的世界性表达。将东方美学精神注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现代设计等新兴文化业态之中,构建起一套区别于西方现代性叙事的本土话语体系,使其在与大众生活的互动中完成自我再生产,进而在全球化语境中确立中式审美独特的文明位阶与坚实的主体性地位。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文化中认出己、从中式审美中找到归属,当东方美学不仅在博物馆里静默陈列,更在街头巷尾、屏幕指尖、日常起居中悄然流淌,中华文明便在这份深沉而自觉的文化认同中,走向更加自信、更加从容的未来。

(作者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历史记忆要“留下来”,更要“活起来”

张蓓蓓

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文脉的活态载体,承载着不可再生的历史记忆与地域文化特质,是市民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的重要依托。武汉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从江汉路的百年风华到昙华林的文艺静谧,从青山红房子的工业印记到汉润里的人间烟火,这些历史文化街区既是城市的根与魂,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如何让历史记忆完整地“留下来”,让街区在现代城市中焕发新生、真正“活起来”,是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课题。

从“保建筑”到“护生态”

过去,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常常局限于对单体文物建筑或历史建筑的“点状”修缮。这种静态保护虽能保住建筑的“形”,却难以延续街区的“魂”。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它不仅仅包含历史建筑、街巷肌理等物理空间,更涵盖了居民的生活网络、传统技艺、民俗节庆等非物质文化以及由特定自然环境与人文活动长期互动形成的文化景观。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要树立整体性保护观,综合考虑物质文化、自然环境、人文活动、社会关系等要素,以确保其整体性和完整性。武汉的保护实践必须超越“保建筑”的单一维度,树立“护生态”的整体性保护观。在保护规划中,不仅要划定好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更要系

统评估街区的社会网络、产业业态和文化基因。例如,在对汉口历史风貌区进行保护时,就不能仅仅修复老建筑的立面,还应同步考虑如何保留老汉口的生活气息和人文温度,通过扶持传统老字号、引入契合文化特质的新业态,实现物质空间与人文精神的整体性存续。

从“政府主导”到“三方共赢”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更新涉及政府、市场、居民等多方主体,若沿用传统的“政府主导、大包大揽”,往往面临财政压力过大、居民多元化诉求难以满足、市场活力激发不充分等问题。

实现街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寻求“三方共赢”的均衡点,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新机制。政府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应起到关键引领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更新政策和街区规划,明确保护底线与发展导向,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有效引导和激励社会资本与居民参与;市场主体要摒弃“大拆大建”的短视思维,积极成为“长期合伙人”,通过长期运营和价值培育,推动渐进式的有机更新,为街区保护注入持久活力;居民是历史文化街区的守望者和街区生命力的活态载体,要主动从“旁观者”转变为“共建者”,积极参与到更新规划、环境整治、文化传承中来。

从“文化展示”到“场景营造”

更好地赓续历史文脉,找准让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的破题切口,不只要留住古城的“形”,更要延续内在的“神”,彰显城市的“魂”。

“场景理论”认为,街区的吸引力并非来自单一要素,而是空间环境、功能媒介、社会群体、文化实践和价值认同的协同作用。要将单一的“文化展示”转向多维的“场景营造”,把抽象的文化价值转化为可感知、可量化的多元要素组合,从而为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利用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当然,场景营造不是机械地堆砌咖啡馆、书店、节庆、市集等元素,“千城一面”的同质化改造会丧失场景营造的独特性和原真性。武汉的历史文化街区每一处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要真正激活这些街区的文化价值,就需要对其历史沿革、空间肌理、人文底蕴进行深度解码,准确把握各个街区文化特质。在此基础上,通过科学规划设计和创新科技赋能,对街区的空间结构、功能业态、景观环境、产业导引等进行精准的“场景营造”,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街区单元”到“区域统筹”

当前,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更加注

重集约高效。武汉历史文化街区多位于老城核心区,发展空间受到一定的约束与限制,单纯依靠街区单元自身发展已难以满足现代城市功能提升与品质塑造的需求。

不断强化区域统筹,优化城市整体空间格局,将历史文化街区从孤立的“街区单元”转变为带动整个区域文化、经济、环境品质提升的“发展引擎”。合理规划历史文化街区与周边交通网络的衔接,优化道路系统,提升街区的可达性,使街区既能保持自身的历史文化氛围,又能便捷地融入城市交通循环,缓解核心区的空间压力。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功能定位和周边区域的功能需求进行系统性研究,全面把握核心功能与潜在优势,科学规划街区功能布局,合理配置空间资源,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共同挖掘和传承城市文化,将街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周边区域的文化元素有机结合,全面提升街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形成特色鲜明、内涵丰富、辐射力强的城市文化品牌集群。

保护好、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要以敬畏之心坚守保护底线,让历史记忆“留下来”;要以创新之思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让历史文化街区“活起来”。坚持保护第一、以人为本、融合发展,让武汉历史文化街区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成为讲述武汉故事、传承楚风汉韵的“金色名片”。

(作者为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教师)